

“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文 君，奚 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战略要求，为解决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供需结构性矛盾提供了方向。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理论，深入剖析“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特征，新需求是社会再生产起点条件的结构性变动，具有高质量、多元化、服务化的特征，其核心是通过信号传导、创新驱动、循环强化三大机制实现供给体系的质的提升与结构优化。本文从激活新需求、升级新供给、打通协同堵点三个维度探索实践路径，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关键词：新需求；新供给；供需关系；全国统一大市场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034(2026)03-0036-12

引 言

扩大内需战略兼具经济稳定与安全双重价值，是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长期根本举措。“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阶段，是夯实发展基础、全面发力攻坚的重要时期。在这重要时期，我国正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挑战。从国际视角审视，全球局势动荡不断，部分国家推行的保护主义举措对国际秩序造成严重冲击，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趋势日益明显，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亟待重塑。就国内情况而言，我国现阶段面临着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及预期、内需不足、物价不振等突出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仍需深化。为此，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的战略要求，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要抓好的八项重点任务之首。

[收稿日期]2026-02-10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世界性贡献研究”(22LLMLA008)

[作者简介]文君(1969—)，女，贵州铜仁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产业经济学；奚韬(1988—)，男，江苏常州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供需关系理论是学界长期研究的领域,并在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①。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我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供给主导型特征,这一阶段的研究侧重于解决短缺经济下的供给不足问题,主要关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端改革和产业政策、国企改革等生产端改革(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选题研究中心等,2016)。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期,需求侧管理逐渐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研究重点,“三驾马车”理论(投资、消费、净出口)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主流框架,郑学工(2007)通过对三大需求趋势的分析,指出中国“高投资、低消费”需求结构导致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21世纪前后,需求侧管理在亚洲金融危机及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方福前,2021),但这种凯恩斯主义特征明显的需求侧管理(刘伟,2016)关注的是总量调控,而对供给结构的关注不足。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新常态已成为明显特征,我国宏观经济矛盾的主要焦点集中在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成为宏观治理与调控的核心内容(刘伟,2024)。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和不协调,尤其是供给侧已无法满足需求侧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和高端化的需求,并且出现了供给扭曲的现象(卢进勇等,2017)。但是,这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通过生产关系调整解放生产力,与西方供给学派存在根本区别。自2020年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我国经济在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都面临了冲击,因此宏观经济治理和调控在机制与政策上需要更加注重协调需求与供给,两端需要协同发力(刘伟,2024)。经济活动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运行需要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层面保持平衡^②。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完善伴随着对供需关系认识的深化,与西方经济学割裂供求分析的传统不同,党中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供求关系作为统一整体考量,是对西方宏观政策理论的突破^③。

综上,已有关于供需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层面上,尤其关于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总量调节层面,把结构调整的功能放在了供给侧。“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提出为这一讨论打开了新的视角。在“十五五”时期,我国的发展路径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④,需求不仅是总量经济的基石,也是创新发展的动力。当下我国需求既存在总量层面的问题,也存在结构层面的问题,供强需弱与供给无法满足需求的现象共同存在。本文尝试在内涵阐释和实践路径两个方面对“新需求引领新供给”进行拓展。第一,以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相互作用的辩证分析为基础,对“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内涵进行阐释。区别于西方经济学供需割裂的分析框架,本文明确新需求是社会再生产起点条件的结构性变动,具有高质量、多元化、服务化的特征,其通过信号传导、创新驱动、

①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②李雪松:《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经济日报》2025年1月16日。

③陈彦斌:《统筹供需的实践成效与理论创新》,《经济日报》2025年10月14日。

④李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人民日报》2025年10月30日。

循环强化三大机制,引领供给体系质的提升与结构优化。第二,本文坚持系统观念,构建需求激活、供给升级、协同保障三位一体的实践路径。推进“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关键在于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促进服务消费为抓手,充分激活内需潜力,以培育高质量供给主体、推动供给结构优化为核心强化供给能力,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政策协同为支撑打通联动堵点。

一、“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理论内涵

“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并非凭空提出的战略构想,而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西方宏观调控理论的超越,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特征与实践导向。其核心机制是通过新需求的信号传导、创新驱动与循环强化等方式,实现供给体系的质的提升与结构优化。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理论的当代发展

“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理论,从宏观角度看,生产与消费分别对应着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样适用于供给与需求(李标,2022)。这一理论为理解供需互动规律提供了根本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与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核心环节。生产决定消费,为消费提供对象、提供方式、提供动力,消费同时对生产产生反作用,使产品最终得以完成,产生新的生产需求。

从社会再生产的视角来看,消费不仅是社会生产的终结,同时也开启了社会再生产的进程,它既是生产的目标,也是推动生产的动力。首先,消费是生产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在社会再生产链条中,生产是起点,分配、交换是中间环节,消费则是闭环的终点,前序所有环节都围绕消费这一目的展开。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能确认它是现实的产品,就像一件衣服因为穿着行为而变成了真正的衣服一样,一套房子因为居住而有了现实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即便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但剩余价值的实现仍需依托商品被消费,脱离消费的生产只会沦为无意义的物质堆砌,最终无法持续,消费为生产划定了边界,决定了生产的合理性与价值性。其次,消费是生产的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强调“消费生产着生产”,通过创造新的需求,消费提供持续的内在动力,使生产获得持续发展。他指出消费“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对象,将需求转化为生产的具体方向。消费可使产品完成“惊险的一跃”,推动生产不断循环迭代,消费者对质量、品类的新需求,会倒逼生产者改进技术、优化供给。消费还能提升生产者的素质,特定水平的消费需求会催生适配的生产能力,从根本上引领生产升级。并且,消费将初始需要再生产出来,形成新的消费诉求,这种动态循环让生产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成为社会再生产持续运转的核心引擎。

“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论断实现了对上述一般原理的深化。当下发展阶段中出现的新需求更多体现为结构、质量和功能层面的变化,其本质是社会再生产起点条件的结构性变动。这种变化通过对产品结构、技术路径和产业体系提出新的要求,进而对供给侧的调整方向和升级方式形成主动引领。在这一逻辑下,“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得以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实践要求相契合,新需求通过推动结构升级、动力体系转换和产业体系优化,有助于缓解长期积累的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依赖要素投入向依靠创新驱动转变,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内在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端是否动力强劲、总体匹配、动态平衡、良性互动。这就需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①。这一重要论述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提供了根本遵循,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内涵。

这一论断在理论层面突破了西方宏观管理体系长期存在的供需割裂思维,实现了对西方宏观政策理论的超越。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都将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割裂区分为相互独立的两套政策思路。前者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侧重从短期视角理解经济运行,认为经济波动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因此政府需要通过逆周期财政支出、利率调节等政策工具填补需求缺口,稳定产出和就业(凯恩斯,2013)。其理论核心在于对消费倾向、投资预期以及货币的流动性偏好等变量上的观测,使需求成为解释经济变化的核心因素。后者则以供给学派为代表,从长期视角审视经济增长问题,强调产出的扩张最终取决于供给能力的提升,认为资本积累、劳动供给、全要素生产率、税制结构以及制度激励等因素是推动潜在产出的关键力量,而需求的变化只是围绕趋势产出的短期偏离。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2012)以短期与长期的时间划分为前提,在形式上调和了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矛盾,但这种调和将需求与供给分别置于两个彼此独立的分析空间,进一步固化了“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的二元结构。长期是由若干个短期构成的,这种抽象了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相互影响、有机联系的二元结构,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很难对结构性的供求错配作出总体的说明和实际的指导^②。而中国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调控实践突破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西方发达国家宏观政策的基本思路,扩大了宏观调控的时空范围和政策布局(郭克莎,2024)。

(二)时代内涵:“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生成背景与核心特征

面对有效需求与有效投资皆不足的现状,“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提出,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深刻变化,是对传统供需失衡问题的主动回应,也是顺应高质量发展规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

^①习近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求是》2023年第8期,第4—8页。

^②陈雨露:《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中深化对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认识》,《人民日报》2025年4月11日。

当下我国供需结构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传统的数量型供需匹配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第一,超大规模市场形成与内需不足的矛盾。我国目前已建成了超大规模市场,按世界银行公布的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①,在现有需求上继续实施刺激政策空间有限,难以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第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特点与供给结构难以适应需求的矛盾。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出现明显的变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消费拉开档次,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供给体系适配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需求结构,随着消费结构升级进程加速,出口需求与投资需求已经呈现出相对下降态势,同时人口结构亦发生重大改变,当下供给结构已经与需求结构的新变化不相适应(郝身永,2020)。第三,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推进与创新性投资不足、传统领域内卷化竞争并存的矛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推进,催生新的技术体系、产业形态和消费需求,但资本配置结构尚未实现有效转向,大量投资仍集中于技术路径相对成熟、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的传统产业,通过规模扩张和价格竞争争夺存量市场,导致重复建设和低水平内卷,创新领域投资不足不仅制约了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也削弱了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能力,使供需的结构性失衡进一步加剧。在上述背景下,单纯依靠总量需求调控已难以奏效,亟须通过培育和释放新需求,引导供给体系重构,为高质量发展打开新的空间。

新需求具有高质量、多元化、服务化的核心特征,与传统需求有着本质区别。高质量是新需求的核心导向,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观念转变,我国居民消费已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变,对产品质量、服务品质、安全标准的要求显著提升,高品质教育、医疗、养老、文旅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多元化是新需求的显著表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需求差异日益凸显,个性化、定制化需求不断增多,既存在对高端奢侈品的需求,也存在对高性价比商品的需求;既存在对传统服务的升级需求,也存在对新兴业态的探索需求。服务化是新需求的重要趋势,服务性消费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从2013年的39.7%提高到2024年的46.1%,但仍然明显低于美国的69%和日本的59.4%,教育、医疗、文旅、康养等服务需求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③。这些新需求具有强牵引性、高成长性和战略价值,成为引领供给变革的核心动力。

被新需求引领的新供给必然要符合技术先进性、业态创新性、场景适配性、质量可靠性等基本要求,因此也是新质生产力最自然、最典型的载体。具体而言,技术先进性是新供给的核心支撑,新供给一定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打破传统技术瓶颈,主动、充分地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来开发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业态创新性是新供给的突出特征,新供给要顺应新需

①郑栅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8日。

②《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13-114页。

③郑栅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8日。

求多元化、服务化的新趋势,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创新商业模式和服务形态,文旅融合、医养结合、数实融合等业态都是新供给适配新需求的极好示范(罗楚亮,2024)。场景适配性是新供给的实践要求,即新供给必须与新需求的应用场景直接衔接,以场景创新的方式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对接,智慧社区、智能工厂、数字乡村等场景本身就是新供给落地的重要载体。质量可靠性是新供给的根本保障,新供给要切实回应新需求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迫切需求,系统性地健全质量标准体系,严格质量监管,把产品及服务的稳定性、安全性、耐用性做到位。由此才能实现新供给既是新需求的被动响应者,也是新需求的主动创造者的格局(刘伟,2025)。

新需求和新供给的时代特征决定了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是一场以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制度改革为特点的系统性变革。这一变革既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通过战略引导、政策支持、环境营造等手段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破解市场失灵问题,为供需良性互动提供制度保障。

(三)核心机制: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传导路径

新需求对新供给的引领作用通过信号传导、创新驱动、循环强化三个层层递进的机制展开,并形成完整的传导链条,推动需求升级能够精准转化为供给创新。这一传导路径既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是“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得以落地的核心保障。

信号传导机制是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基础环节,其核心功能是将分散的需求信息转化为清晰的市场信号,引导生产要素向高效供给领域集聚。传统需求信号的载体主要是价格、利润等,消费活动通过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产生信号,引导企业调整生产决策,构成了市场调节的微观基础(李帮喜等,2025)。新需求具备的高质量、多元化、服务化的特征使其释放的市场信号呈现出多维度、精细化的特点。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居民消费行为通过平台数据、搜索行为、用户评价以及场景应用反馈等形式不断沉淀为结构化信息资源,使需求变化能够更加精准地传递至供给端,缩短需求变化向供给调整转化的时间周期。例如当绿色家电、智慧健康、数字文创等新需求出现快速增长时,不仅通过价格与利润率变化形成传统市场信号,还通过平台数据反馈和场景应用扩展形成更高效精准的需求识别路径,引导企业围绕新需求制定差异化生产策略(孙巍等,2025)。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除了市场自发形成的信号外,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标准制定、消费引导等方式释放的政策信号,也能够与市场信号形成互补,进一步强化新需求对新供给的引领作用。

创新驱动机制是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核心环节,其核心功能是通过需求倒逼激发供给端的创新活力,推动供给体系实现质的飞跃。新需求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对产品性能、服务模式、技术标准的新要求,这些要求往往超出了现有供给体系的能力,从而倒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业态创新与模式创新。在消费领域,居民对高品质、个性化、健康化产品的需求,倒逼企业从功能满足向场景体验转型,开发出智能互联、健康监测、绿色节能等新型产品;在服务领域,数字经济发展对智慧物

流、在线医疗、远程办公等需求,倒逼服务业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创新服务交付模式(魏爱云等,2024)。在产业领域,制造业转型升级对高端材料、精密仪器、工业软件等需求,倒逼相关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李晓华,2023)。这种需求倒逼创新的机制,能够提升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攀升,实现供给体系的系统性升级,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这种倒逼机制提供了制度保障,实现分工演进与市场规模扩大的正向循环(周绍东,2023)。

循环强化机制是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升华环节,其核心功能是实现供需两端的螺旋式上升,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增长动力。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过程并非单向传导,而是通过“需求升级——供给创新——需求再升级”的循环实现持续强化。新供给在满足现有新需求的同时,会创造出更高层次、更广泛的新需求,这些新需求又会进一步引领供给端开展更深层次的创新。例如居民对居住品质与便捷生活的需求升级,引领智能家居从单一设备向场景化供给,创新智能音箱、联网家电等产品的完善,不仅满足了初步的便捷控制需求,更催生了对智慧家庭生态、全屋智能联动、跨场景服务的新需求,而这种生态化需求又进一步推动企业突破设备互联协议、数据协同算法等技术瓶颈(杨栩等,2022)。这种循环强化机制使供需两端形成正向反馈,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其核心要义就是激活这一循环强化机制。良性互动不是简单的供需总量匹配,而是通过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螺旋式循环强化,实现供需从“低水平平衡”向“高水平平衡”的动态跃升。只有通过循环强化让供需达到动态平衡,才能打破重复建设和低水平内卷的困境,真正实现消费与投资、供给与需求的有机融合和良性互动(徐华亮,2026)。

二、“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①。推动“新需求引领新供给”落地见效,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既要夯实需求基础,又要强化供给能力,更要完善协同机制,通过多维度举措破解供需联动堵点,充分发挥新需求的引领作用,实现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

(一)激活新需求:夯实引领新供给的基础支撑

激活新需求是“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前提,消费不振是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问题。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特别是服务消费差距明显^②。应当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促进服务消费发展为抓手激活新需求,强化需求对供给的引领效能,为新供给的形成提供坚实基础。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17页。

^②郑栅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8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是激活新需求的根本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①。居民消费能力提升,需要从收入、时间和预期三个方面协同推进。在收入层面,以稳就业促增收为重点,通过扩大就业岗位与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夯实居民持续增收的基础。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效率提升之间的协调,重点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增强其现实购买能力,在短期内可通过面向居民的补贴、消费券等普惠性政策工具,来减轻收入限制对消费的影响。在时间层面,围绕带薪休假制度落实不充分的问题进一步健全制度约束与配套机制,明确用人单位落实带薪休假的法定责任,结合不同行业、岗位和用工形态的实际情况,探索弹性工时、错峰休假和分段式休假等安排,提高居民可支配时间的灵活性和可利用性,加强休假制度与文旅、体育、健康等消费供给的协同,完善假期公共服务和消费配套,引导各类休闲消费场景与休假节奏有效衔接。在预期层面,持续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制度覆盖范围,提高基本保障水平和制度稳定性,降低居民在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不确定性,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全国统筹和转移接续,增强制度安排的确定性和连续性。通过稳定就业政策和清晰的政策安排,减少居民对未来收入波动和风险支出的担忧,在制度层面为居民形成更加稳定、可持续的消费决策提供支撑。

顺应居民消费趋势,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是激活新需求的关键举措。随着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我国衣食住行等实物消费量已位居全球第一,服务消费成为内需增长的重要引擎,我国服务消费增长速度已快于消费整体增速。2013—2024年,我国服务消费增长率为148.1%,快于消费总体增长率113.5%,也快于居民收入增长率125.6%,居民服务消费呈现由生存型向享受型和发展型变化的趋势(李勇坚,2025)。促进服务消费要从放宽壁垒,提质增量两方面推进。在放宽壁垒方面,系统清理制约服务消费扩张的制度性约束,降低教育、医疗、养老、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的市场准入门槛,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隐性限制,扩大社会资本参与服务供给的空间。针对平台经济和服务新业态发展,加快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监管规则,推动监管方式由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为服务创新和消费扩张提供稳定制度预期。在提质增量方面,加快补齐高品质、差异化服务供给短板,推动服务内容和模式创新,提升服务供给与消费需求的匹配度。结合服务业劳动密集、质量导向强的特征,优化相关财税政策,减轻高质量服务企业成本压力,引导企业由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和品牌建设。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文化和体育等领域的投入,改善服务供给条件和消费环境,增强服务消费的可及性和便利性。在此基础上,推动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深度融合,拓展产品+服务、场景+体验等新型消费模式,持续激活新需求。

^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639页。

(二) 升级新供给：强化响应新需求的创新能力

升级新供给是“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核心，新供给集中体现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刘伟，2025)。要以培育高质量供给主体、推动生产要素升级、推动供给结构优化为核心提升供给对新需求的响应能力与创新能力，实现供给体系与需求结构的精准适配。

培育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供给主体，是升级新供给的重要基础。新供给的形成依赖于企业创新能力的不断积累，企业在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应强化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动企业围绕新需求开展面向市场的研发活动和产品迭代，提升供给的质量和差异化水平。通过健全企业创新激励机制，支持具备技术优势和市场敏感度的企业加快成长，逐步形成一批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骨干企业，增强供给体系的稳定性和延展性。同时，引导企业发展方式由以规模扩张为主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提升，使供给体系能够更加灵活地适应需求变化。

推动生产要素升级，是升级新供给的核心支撑。生产要素的适配性升级是供给体系对接新需求特征的重要基础，相较于传统需求对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依赖，新需求对技术、数据、知识等新型生产要素的依赖度显著提升(米加宁等，2025)。应加快技术要素的创新突破与产业化转化，聚焦新需求重点领域推动核心技术、关键工艺的迭代升级，筑牢新供给的技术支撑体系。健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础制度，完善数据确权、交易流通与安全保障体系，推动数据要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据要素赋能供给体系的精准化升级。强化知识要素的积累与转化，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构建知识创新体系，培育适配新供给发展的专业人才队伍，为供给升级提供持续的智力支撑。

以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推动供给结构优化，是升级新供给的关键路径。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质量提升，促进其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演进，提高既有产业对需求升级的适应能力。同时，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围绕新技术、新应用和新场景拓展供给空间，形成新的供给增长点。在此过程中，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通过服务型制造、数字化赋能和产品服务一体化，增强供给体系的柔性和响应速度，提高供给对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匹配程度。通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和供给质量稳步提升，推动供给体系向更加注重创新和适配的方向演进，为新需求持续引领新供给奠定坚实基础。

(三) 打通供需协同堵点：完善供需联动的制度保障

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并非自动实现，而需依赖需求侧与供给侧、政府与市场、各地区与各产业之间的多维协同，以及清晰、稳定和可预期的传导机制。现实中，需求信息在市场层面呈现碎片化特征，难以形成对供给主体具有约束力和引导力的信号。完善制度保障是“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关键，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破解供需联动堵点，为多维协同下的“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打通新需求向新供给的传导链条,要点在于完善统一规范的市场体系,增强需求信号在市场中的传递效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应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清理妨碍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强化各地区、各产业的协同,实现“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①,推动需求变化能够在更大范围内通过价格、规模和结构调整等方式被供给主体感知和响应。同时,围绕新消费、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发展,加强需求侧数据的整合和应用,提升市场主体对需求结构变化的判断能力,缩短需求变化向供给调整的传导时间,为供给主体开展面向新需求的创新活动提供更清晰的决策依据。

在此基础上,宜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破解供需联动堵点。新需求向新供给转化,依赖资本、技术、劳动力、数据等要素在不同领域和主体之间的顺畅流动。应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推动要素价格由市场形成,引导要素资源向更具创新能力和需求响应能力的领域集聚,降低供给主体围绕新需求调整结构和布局的制度成本。同时,通过提升要素配置的灵活性和适配性,增强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的调整弹性,使供给创新能够更快转化为现实产出和有效供给。通过需求侧与供给侧、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推进,逐步消除制约供需互动的制度摩擦,为新需求持续引领新供给创造更加顺畅、稳定的制度环境。

三、结 论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理论为根基,紧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战略要求,立足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供需结构性矛盾,系统阐释了“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理论内涵、内在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发现:(1)新需求的本质是社会再生产起点条件的结构性变动,并非简单的需求总量扩张,其与传统需求存在本质区别,具有高质量、多元化、服务化的核心特征。(2)新需求对新供给的引领作用通过信号传导、创新驱动、循环强化三大层层递进的机制实现,形成完整的传导链条。(3)推动“新需求引领新供给”落地见效必须坚持系统观念,需构建“需求激活、供给升级、协同保障”三位一体的实践路径,三者相互支撑、有机融合。

本文在理论层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理论的当代内涵,阐释了“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内在逻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应用与发展;突破了西方经济学供需割裂的分析框架,摒弃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的二元结构,将供需关系视为有机统一的整体,构建了“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核心传导机制,揭示了供需之间螺旋式上升的动态平衡关系,为理解供需良性互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推动“新需求引领新供给”落地,应在需求、供给与制度保障三个层面协同发力。在需求层面应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促进服务消费发展,夯实新需求形成的基础条件。在供给层面应围绕现代产

^①李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人民日报》2025年10月30日。

业体系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与促进生产要素升级推动供给体系向高质量与高适配方向演进。在制度保障层面应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重点,提升要素流动效率与需求信号传导效率,从而为供需良性互动提供稳定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 [1]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 宏观经济学:第19版[M]. 萧琛,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 [2] 方福前. 正确认识和处理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关系[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41(4): 4-11.
- [3] 郭克莎. 进一步深化宏观调控的改革创新[J]. 经济学动态,2024(7): 7-11.
- [4] 郝身永. 坚持全方位扩大内需与优化供给有机结合破解内需不足难题——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的体会[J]. 当代经济管理,2026,48(3): 1-13.
- [5]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选题研究中心,王佳宁,盛朝迅. 重点领域改革节点研判:供给侧与需求侧[J]. 改革,2016(1): 35-51.
- [6] 李帮喜,李宁,熊子仪. 新旧动能转换与高质量发展:理论阐释、基本逻辑与实践路径[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5,42(12): 5-23.
- [7] 李标. 新时代需求侧管理的政治经济学阐释[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265(7): 107-118.
- [8] 李晓华. 制造业发展趋势与中国制造业升级方向[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5): 51-58.
- [9] 李勇坚. 迈向“十五五”的服务消费:现状、趋势与政策建议[J]. 当代财经,2025(12): 3-17.
- [10] 刘伟. 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以高水平供给创造需求——学习习近平宏观经济治理供求关系良性互动的论述[J]. 治理研究,2024,40(1): 4-12+2+157.
- [11] 刘伟. 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J]. 当代经济研究,2025(12): 5-11.
- [12] 刘伟,蔡志洲. 经济增长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求是学刊,2016,43(1): 56-65.
- [13] 卢进勇,宋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走出去”战略新思考[J]. 国际贸易,2017(2): 21-25.
- [14] 罗楚亮. “上门经济”拉动消费性服务业发展[J]. 人民论坛,2024(3): 60-63.
-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6] 米加宁,李大宇,董昌其. 新质生产力引致生产力要素质态重构的理论纵深——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理论阐释[J]. 华东经济管理,2025,39(5): 1-12.
- [17] 孙巍,梁世杰,赵奚. 扩大内需、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形成——引入收入分布变迁的一般均衡分析[J]. 数量经济研究,2025,16(2): 1-30.
- [18] 魏爱云,潘丽莉,刘哲. 当前公众消费新特点与新趋势调查报告(2024)[J]. 人民论坛,2024(19): 20-23.
- [19] 徐华亮. 扩大内需战略下新需求与新供给动态协同: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经济学家,2026(3): 26-35.
- [20] 杨栩,孟明明,李宏扬. 智能家居联动场景下消费者线下体验对线上购买行为的链式影响机制研究[J]. 商业研究,2022(4): 67-75.
- [2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宋韵声,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 [22] 郑学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大需求走势分析[J]. 统计研究,2007(9): 11-16.
- [23] 周绍东. 社会总供需动态平衡:大国经济发展的基石[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7): 24-32.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New Demand Driving New Supply”

WEN Jun, XI Tao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he strategic requirement of “new demand drives new supply, and new supply creates new demand”, thereby providing a direction for addressing the structural supply–demand contradictions in China’s transition to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of “new demand leading new supply”. It posits that new demand represents a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initial condition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featuring higher quality, greater diversification, and a service-oriented nature. Its core is to achieve the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the supply system through three major mechanisms: signal transmission, innovation-driven, and circulation reinforcement. To this end, this paper proposes practical pathways from three dimensions—stimulating new demand, upgrading new supply, and removing coordination bottlenecks—so a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words: New Demand; New Supply;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责任编辑 祝子白 白光)